

《水浒传》英译本的历时描写研究

高磊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霍姆斯和图里等人构建的描写翻译学采用的描述性方法为现代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自1872年香港首现《水浒传》节译本至今,陆续出现了十余种英文节、全译本。拟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从历时性角度研究《水浒传》的译介过程,考察该名著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按历史阶段对其重要译者及译本进行梳理,分析各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体共性,客观描述影响其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诸多因素,以期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 《水浒传》; 英译本; 历时性; 描写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 I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5-0127-07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Shui Hu Zhuan* under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GAO L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DT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 translation theory formulated by J. Holmes and G. Toury,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Shui Hu Zhuan*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in 1872 in Hong Kong,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10 complete or abridged versions to date. This paper, by adopting the diachronic descriptive approach, historically studies some of its major English versions and translators,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ir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its translation so as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ui Hu Zhuan* and gain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very nature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 *Shui Hu Zhuan*; English versions; diachronic perspective;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霍姆斯(J. Holmes)最早于1972年提出描写翻译学的理论,认为翻译学由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组成。而纯理论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分支: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继霍姆斯之后,图里(G. Toury)对该框架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在他看来,翻译是“众多变量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形成的产物:原著不是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中心,对翻译有着

重大的影响的包括有译者、读者、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1][2]}该理论主张探讨诸多的翻译现象应该采用描写研究的方法:以现实的翻译现象(包括翻译行为、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客观描写与分析,探究译者的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探讨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归纳出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中制约与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

收稿日期: 2012-06-28

作者简介: 高磊(1979-),男,湖北黄冈人,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描写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不同的视角展开。其中后者适用于对同一原著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多个译本进行研究。《水浒传》的译介历时百余年,出现了10余种的英文节译、全译本,其适合采用历时性描写方法来进行研究。

一 《水浒传》英译本进行历时性研究的必要性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的问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性和文学性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今世界上最知名、最权威的三大百科全书之一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又称《大英百科全书》)中有专门章节重点介绍,并对其文学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英译家杰克逊说:“《水浒传》体现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的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2][3]}目前,它已有英、法、德、俄、日、韩、泰、及拉丁等文字的数十种译本。本文试图梳理百余年间出现十余种《水浒传》英译本,根据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探寻特定历史背景下译者的意图,总结各个阶段译本的共性,再现原著的译介轨迹及其影响,论证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的存在。

二 《水浒传》英译本的历时描写及特征

(一)《水浒传》英译本的历史分段描写

我们将《水浒传》英译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并对各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译本加以考证和研究。

第一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

这一时期《水浒传》的英文译介数量很少,地域仅限于当时的香港英租界。1872年香港的一部重要的汉学期刊《中国评论》第一卷载有《一个英雄的故事》,是由一个署名H. S.的译者节译的。这是有关《水浒传》英译的最早记载。其内容为《水浒传》前十九回关于林冲的故事。这些节选译文只围绕特定人物的事迹展开,编选重要情节,未及全书。

为何《水浒传》的英文译本大陆内地不见,而在香港可见呢?这得从《中国评论》这一刊物的性质说起。《中国评论》,又名《远东释疑》,是一份主要刊登英文汉学评论的刊物。主要撰稿人和读者均

由英美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公务员、商人、报刊记者等组成。他们这一群体大多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沿海港口城市,比较爱好和仰慕中华文化,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变迁,同时还积极向海外译介中国。19世纪后半期,西方汉学正经历着迅猛的发展,而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也正由业余向职业化转型和过渡。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评论》都有亲自见证。作为研究西方汉学史(特别是中国19世纪后期)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国评论》完整地记录了汉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学术面貌在西方(尤其是欧洲)所取得的进展。该刊物逐渐成为了译介中国文学的主要窗口,向外译介的包括有中国小说、诗歌、民间文学等等。它还刊载有当时一些主要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文本的阅读阐释,既包括传统经典文学文本,又包括丰富浩繁的民间文学文本。英语成为了当时汉学家们投稿《中国评论》使用的主要语种,而追溯到18世纪、19世纪上半期,西方汉学及东方学的研究主要使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的语言,因为在那时这些国家的汉学研究更为发达。这一变化昭示着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已经转移到英国和正在逐渐崛起的美国,不再局限于欧洲大陆了,这一过程是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的。《中国评论》上所刊载的《水浒传》部分章回的译文,较为客观地审视、考察了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与人性方面的特征,基本采用对华中立、宣扬普世价值观的立场。英国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在译者身上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译者具有着双重的矛盾身份:他们是仰慕中华文化的,同时又执行着西方的炮舰政策;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后积极向东方移植着人文精神,又在中华文化向外流播的空地上拓荒。而19世纪下半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西渐”过程和中西文化的对话,由《水浒传》的初步译介也可见端倪。

总的说来,“缓慢”是这一时期的《水浒传》英译历程较为突出的特点。与这一现象有着很密切关系的自然是当时的晚清政府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除此之外,在历代专制王朝的眼里,《水浒传》均被斥为“诲盗”之书,在国内(除香港、澳门外)都

屡次查禁《水浒传》的中文原著,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水浒传》的译介过程是从香港开始,而非大陆境内。

与当时腐败落后的“天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以后,用枪炮洞开了中华封建帝国的大门。在香港的第一个汉学研究中心正是由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建立。联翩渡海来华的有各国的殖民者、传教士、冒险家、商人、旅行者等,他们都有着自身的政治、宗教和商业利益的需要。这也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风俗习惯在西方的传播。香港是当时大英帝国在华的租界,相对比内地,有着更为浓厚和宽松的学术氛围,《水浒传》的译介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展开。当然,从主观上来讲,对汉学展开研究,对中华文化经典进行阐释是当时《水浒传》得以向外译介的更为直接的目的。这一阶段的《水浒传》译介,基本采用的是以归化和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译者尽量做到还原原著的全貌。而在选材方面,只节译了《水浒传》原著中家喻户晓的典型英雄人物的事迹,因其性格特征较为鲜明且为大众熟知,也更利于国外读者对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国民性格特征的认识和了解。

第二阶段:20世纪30、40年代

这一时期是《水浒传》译介的重要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许多明清小说得以全面开禁,大量流传。加之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很多白话小说便被捧上了正宗文学的宝座。显然,这样的时代背景也为《水浒传》的译介扫清了障碍。

据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统计,20世纪30、40年代,《水浒传》的印数最多,读者最广,居于四大古典小说之首。与此同时,《水浒传》的译介也进入了活跃时期。一战后的美国迅速崛起,随着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向亚洲扩展,中国及亚洲研究领域也逐渐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在汉学研究上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在1920~1938年间最为明显。1923年翟理斯(H. A. Giles)的译著《中国文学史》在美国纽迪·阿普尔顿出版社得以出版,其中刊载有《水浒传》的一段译文,“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为其主要内容。虽然这只是一段节译,却是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首次在境外被译介。此外,这一

时期还出现了三个较为重要的译本:(1)1929年英国伦敦豪公司 and 美国纽约 A. A. 诺夫公司分别出版了《水浒传》七十回本的英文节译本,书名为《强盗与士兵》,是英国汉学家杰弗里·邓洛普(Geoffrey Dunlop)经埃伦施泰因的德文本的转译本(以下简称“杰译本”)。该译本采用的是金圣叹的70回本,在思想上、内容上已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是第一部英文全译本。(2)1933年由纽约约翰·载公司及伦敦梅休安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水浒传》的英译本,由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根据金圣叹的70回本《水浒传》翻译而来,书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3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70回节译本《水浒》,^{[2]45}由英国学者杰克逊(J. H. Jackson)翻译,方乐天编辑。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译者之一的赛珍珠。她本人有着很强的中国情结,是一名中国通,在中国度过了整整40年的时光。她正在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任教(1919~1934),期间于1927~1932年完成了《水浒传》70回的英文全译本,前面附有林语堂写的导言,该翻译过程历时4年多。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战火纷飞、动荡不安,中国各知识阶层奋起救国图强、为民请愿。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被卷入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之中。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国土上的公民,一名从事高等教育多年的美国学者,赛珍珠亲历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思潮的涌动可谓身临其境,深有感触。然而,赛珍珠毕竟是一个特殊人物:具有双重身份背景和双重文化情结。一方面,她对中国社会给予关注,对中国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命运给予同情;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顾及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4]61}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当时的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竞争也随之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镀金时代”的大潮将“黄金时代”的“美国梦”冲洗得荡然无存。此时的美国学界,深受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进化论的影响,很多文学作家,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亲历苦难的作家们,开始对美国的社会进行深刻反思。他们采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当时

的社会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底层社会的现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为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满足当时美国社会急于吸收外来文化,消除其文化贫弱,进而实现文化独立的现实需要。赛珍珠选取了《水浒传》70回原著,在她看来,《水浒传》70回本“出色地刻画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它描述的不仅是中国的过去,更是现在。小说不仅是对过去人民的写照,也是对当今社会的写照”,^{[3]48}这就使得小说“去掉了小说的革命文学的立场,转而成为迎合统治阶级需要的道德说教。”^{[3]50}它“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而120回本的“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3]15}。从翻译策略来看,赛珍珠译本总体采用直译,尽量保留原作的意义和风格,保留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她甚至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些即使是中文读者也不很感兴趣的内容。对原文中那些质量不高的打油诗照样译成了打油诗,译后又和中国的朋友一起通读了译本,逐字对比了译本与原本。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初衷就是想把它忠实地介绍给西方读者,因而在中文语言、表达方式、行文特点方面多加保留。为了让国外读者既能领略到美妙的民间传说,又能吸收原作的内容及写作风格,在译文中她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赛珍珠选取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进而将书译为 *All Men Are Brothers*,非常深刻地体现出书中众多绿林好汉的侠义精神。1933年出版的《中华月报》评论说,赛珍珠译本“忠实地译成英文”,“真是不易多得的杰作”,译作中的“人物颇与英国的罗宾汉等绿林豪杰相似,合西洋人口味。”^[5]此译本一出,深受广大欧美读者的推崇与喜爱,至今在国外亚马逊等网上书店,仍可看到该译本的一版再版和热销情况。

杰译本《水浒传》与赛译本产生于同一时代。杰弗里·邓洛普是英国有名的汉学家,他所处的年代,英国刚经历一战,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政治上逐渐失去“日不落帝国”昔日的辉煌,而文学创作也日渐削弱。英国文学界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在文学体裁中则“出现了与努力使艺

术接近广大人民阶层有关的”,“更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的形象”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6]880}这些作品刻画的是值得同情的“受苦受难、颠沛流离的小人物”^{[6]880},在人物描写上与《水浒传》如出一辙。当时的衰退英国文学急需外部文学的给养和输血,而《水浒传》在体裁和内容上正迎合了这种需要。由此可见,杰克逊本人是肯定了《水浒传》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价值的。当然,杰译本中出现了大量任意的删节和改写,就价值观念而言,译作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学形式规范中心论思想倾向,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普遍文化”意志和权力对原语文化的蔑视和侵犯。

这一时期的《水浒传》英译本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原著均采用民国初年流行的金圣叹腰斩本(七十回)。自始至终贯穿着梁山好汉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并省去了招安等情节。由此可见,译者在选取原著版本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时代因素的限制。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时代的主流,体现出革命者与当时的当权派势不两立的革命姿态。因而身处革命浪潮之中的译者,受到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气候的浸染,在选材方面舍弃了“革命者向当权派妥协”^{[4]58}的招安情节,保留彻底的革命精神而非达成妥协。无论是赛译本还是杰译本,其翻译的目的,更多的是从中借鉴《水浒传》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推动本国文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其输入新的血液。而“并不试图从学术上作什么探讨,也不在解释和考证方面过多下功夫。”^[7]

第三阶段:二战后至文化大革命后期

因其独特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的《水浒传》译介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二战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大陆内地《水浒传》的译介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在国外,1947年耶鲁大学纽黑文出版、由小詹姆斯·I. 克伦普翻译的《水浒传:选录》英文选译本。这一时期的译者活动主要集中于对已有译本进行修改、补充、重译。根据《中国翻译词典》介绍,赛译本是当时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一个译本,于1948、1957年在英美一版再版。而在1963年,杰克逊也对其以前的译本进行了加工、修改、重译,整理完后在香港继续出版。此后该译本又于1976年分别由纽约帕拉贡图书重印公司和剑桥C.

& T. 公司再版。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是著名美裔翻译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他一直在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做翻译,并于1963年加入了中国国籍。他的《水浒传》100回全译本(译名为《沼泽地边的不法之徒》或《亡命水泊》)^{[8]22}于198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虽然该英译本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但该书的翻译活动却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文革”晚期)展开的。在“文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沙博理当初在选择原著版本时,似乎也显得身不由己,费尽心思。“100回版本更接近于那个方针的要求”,因为“70回版本结束时,盗寇仍在被迫捕中,而100回版本则让这些盗寇归顺了皇帝。”^{[8]30}由此可见,译入语的时代背景极大地左右着译者在选材方面的抉择。与别的英文译本不同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沙博理采用的是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尽量做到灵活处理原文的信息。在他的译本中,他努力克服直译的“困难”和意译的“不准确”,力求达到最佳的效果。不过,沙译本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节,凡涉及诗词的部分均未译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压抑和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

这一时期《水浒传》的译介特点是选译、节译、重译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官方的主流思想是反水浒的,并由此经历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评水浒运动”。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加之译者特殊的公民身份及其从事的工作性质,使得他们一方面需考虑当时政治批判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西方读者对异域古典作品译本的期待:即“对生活在遥远国度里一个古代民族的一种‘感受’,对原著风格的一种感觉”^{[9]35}。这一时期《水浒传》原著选材方面,译者更显谨慎,能清楚地看出意识形态、赞助人操纵翻译过程的身影。

第四阶段:冷战结束至今

这一时期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极度动荡不安。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实体,正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呈现出美国“一超独大”的格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呼

声连绵不断,意识形态对立表面似乎得以消解。《水浒传》的译介活动仍在持续:1994~2002年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分四次陆续出版完约翰·登特-杨和阿莱克斯·登特-杨(John and Alex Dent-Young)父子合译而成的五卷本英译《水浒传》,该译本的翻译过程前后耗时8年,书名定为《水泊梁山》。^{[9]57}这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英译的又一重大成果。全书共2229页,93万6千多字,是迄今为止《水浒传》英文全译本中内容最全、篇幅最长(120回)、参考版本范围最广的,是世纪之交《水浒传》的英译典范。约翰·登特-杨为英国学者,曾在香港任教。他的夫人是一位华人,儿子毕业于伦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因而都深谙中西语言文化。而《水浒传》的翻译计划是在John Minford(闵福德)和Sean Golden的建议和支持下实施的;Joseph Lau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且还还为译本作了颇具价值的评论;香港学者朱志瑜在诗歌翻译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David Pollard, Eva Lau和John Deeney对译稿进行了多次阅读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David Boothby和其他学者对译本的可读性进行了探讨和评论;而该英译本重译时所参照的蓝本即为Sidney Shapiro的英译本和Jacques Dars的法译本。由此可见,该译本并非某一一人一己之力的结晶,而是众多“合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登译《水浒传》的翻译全过程采取了合作的方式,有时候甚至是全家上阵。主要译者为John and Alex Dent-Young父子,但身为妻子和母亲的Maria Tao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正因此,登特-杨父子将译本的第4-5卷题献给她。此外,在体制方面,登译《水浒传》模仿霍译《红楼梦》采取独特的分卷方式,即根据各卷内容和核心主题为各卷分别冠以总名,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使读者对作品内容一目了然。

登氏父子在译者序中对于关于该译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有着明确的陈述:“所有的翻译都有妥协的成分。我们就是要使我们的英语译本具较强的有可读性。尽力避免使用在英语中可能造成不当意义或联想的表达法,我们也不允许出现任何与译入语境意义不符的东西……在词序和句长上很

下工夫,力图保持英语行文规范的连贯、重心和节奏。”^{[9]3}译者在前言中写道,“本译文必须尽量具有最大的可读性,我们一方面要保留中国古代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方言及成语用最流畅的英语表达。”^{[9]4}由此不难看出,登氏很关注《水浒传》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体特征和艺术价值。在翻译策略采取的是归化与意译,强调广大读者的接受程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从译者序中看到该译本带有明显的政治文化倾向。登氏以自己所解读到的信息向西方读者展示他心目中的“中国国民性”:即反叛、暴力、淫秽、报复、欺骗、残忍等。与之相对的,对书中英雄人物忠诚、宽仁、仗义、诚实的一面却较少关注,其后殖民主义的翻译价值取向是非常明显的。

总结起来,本阶段《水浒传》的英译现象有别于以往任何阶段,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

(1)译者选择原文版本多渠道化,杂文化,各版本间有着明显的互文性;

(2)翻译过程不再局限于个人行为,逐渐形成译者、同行、友人、家人、评论家等共谋的局面;

(3)原著的文体特征和艺术价值得到更大关注;

(4)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得以体现,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得以张扬,而原语文化得以操纵、改写、压抑、曲解;

(5)归化翻译(流畅地道的目的语翻译;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取代原语文化价值观)仍是很多英美译者的自觉选择。

(二)《水浒传》英译本的历时特征详述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水浒传》英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写,我们描绘出《水浒传》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大致面貌。这一历程跨越140年,涵盖10多个不同的节译本、选译本、转译本和全译本。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下表所示的7个方面(参见表1)。

表一 《水浒传》英译本的历时特征详述

	第一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	第二阶段 (20世纪30、40年代)	第三阶段 (二战后至文化大革命后期)	第四阶段 (冷战结束至今)
主要译本	《一个英雄的故事》(1872)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片段译文(1923) 《强盗与士兵》(1929) 《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 《水浒》(1937)	《水浒传:选录》(1947) 赛译本再版(1948,1957) 杰译本重印(1963,1976) 《沼泽地边的不法之徒》或 《亡命水泊》(1980,1981)	约翰·登特-杨父子《水泊梁山》(1994-2002)
参考版本	不详	金圣叹70回评定本	赛译本采用金圣叹70回本 杰译本采用金圣叹70回本 沙译本采用容与堂100回本	商务印书馆120回本《水浒传》 ^[10] (1958) 雅克斯·达尔斯的法译本(1978) 沙博理的英译本(1937)
译本类型	节译(前19回)	转译、全译(70回本)	选译、重译(70回本)	全译、合译(120回本)
出版地	中国香港	英国、美国、中国上海	英国、美国、中国北京	中国香港
翻译目的	汉学研究、阐释经典	创新美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写作手法 丰富及给养英国文学	修改、重译已存节译本 译介古典、探讨人文精神与历史价值	解读人文精神、关注艺术价值、剖析政治制度、权力关系
翻译策略	异化	赛译本异化、杰译本归化	沙译本采用归化、异化结合	归化、改写 ^[11]
译者身份	传教士、学者	汉学家、学者	汉学家、作家、学者	译者身份更趋多元化,并出现不同学者合作翻译现象

表1显示,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因为译者各自所处的时代和身份不同,翻译目的与策略选择也存在差异,这使得《水浒传》英译本呈现出逐步变迁、日益开放的局面。在这一漫长演变过程中,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变化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方式的变化,不同的英译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和阐释着中华文化和国民性格特点。而整个翻译的过程也从客观上反映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的所具有的复杂性。

本文对跨越近一个半世纪、拥有10余种译本的《水浒传》英译本进行了系统的历时性描写,并概括出该过程的发展脉络。此项研究得出以下五点结论:(1)霍姆斯与图里建立起来的描写翻译学理论,为我国的经典名著英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来考察翻译现象,将会更为全面与客观,可以避免传统译学研究中的片面化。(2)《水浒传》英译历程的描写性研究表明,从最初的节译、选译方式,到转译、重译,再到全译、合译,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事实,对其展开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复杂的倾向。(3)在《水浒传》英译的历史长河中,尚没有由中国裔的译者翻译的译本,对于这样一部富含中国文化,具有独特语言特点和叙事结构的中国英雄传奇文学巨著的对外传播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华人译者积极地弘扬中华文化,可以更好地避免文化失真。(4)翻译目的不仅是译者个人价值取向、艺术偏好的产物,而且还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的多重影响和制约,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结果也会影响译者对原作的选择;(5)由于译者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不同,译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都对原著进行了调整、变通、删节和改写,从而在接受了原

著的一些内容和形式的同时,也压抑和排斥了原著的一些内容和形式,表现出译语与原语既契合又悖离的双重特征。

参考文献:

- [1]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2] Jackson J H. *Water Margin* [M].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63.
- [3] Buck, Pearl S. *All Men Are Brothers* [G]. 2 vols.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3.
- [4] 陈敬. 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 [5] 孙建成. 《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D]. 天津: 南开大学. 2007: 22.
- [6] 秦水. 英国文学史(1870-1955)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7] 马红军. 为赛珍珠的“误译”正名[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3).
- [8] Shapiro S. *Outlaws of the Mar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0.
- [9] Dent-Young, Alex. *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 [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2002.
- [10] 施耐庵, 罗贯中. 水浒全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 [11]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621-622.

责任编辑: 李珂